

# 追逐！为你漂洋过海

2000年，在成立的第三个年头里，《北京晨报》用脚步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她的足迹跨过了渤海湾，也越过了太平洋。她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以“信息早餐”为品牌形象的综合性主流都市报。这一年的8月12日，《北京晨报》从位于灯泡厂的旧址迁入东环广场。



## 在我身边的历史 新千年 我在海上迎接



1999年12月31日，年轻的北京晨报推出了大型的“北京晨报迎新千年曙光”活动。

下午，北京晨报邀千名读者，分乘45辆大巴浩浩荡荡向天津港进发，进港后迅速换乘轮船向目的地大连进发。在客轮上，当2000年在大家的期待中来临的那一刻，汽笛发出长时间的鸣叫，所有参加活动的读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2000年的到来，人们在海上见证了迎千年的特殊喜悦。轮船到达大连，1200名晨报读者受到了大连市委、市政府和大连人民的热情接待，与此同时在大连星海会展中心26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内共享“新千年第一宴”。当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向家乡人民问候新年时，宴会厅内掌声雷动，人们频频举起酒杯为新千年献上深深的祝福。

晨报记者 杨秀梅

## 2000年大事记

- 1月1日，晨报推出《问候2000》特刊，对新千年举世欢庆的盛况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 6月11日至7月10日，晨报推出高考专版、专刊。
- 8月12日，北京晨报正式迁入东环广场新址办公。租用的新址建筑面积达4480平方米，在京城媒体中率先采用“无纸化办公”。
- 11月28日至12月3日，晨报连续发表了“京彩透视”系列报道，从独特新颖的角度客观分析了“彩票热”现象。

## 【这一年我进入晨报】

### 校对证券累出幻觉

我是2000年进入报社的，与报社风雨同舟已八载，我从事的证券版校对工作虽然是个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岗位，但我一直以锱铢必较的态度、勤勉有加的精神对待每一天的工作。证券版的字号比其他版小，而且没有图片，所以版面容纳的文字量比较大，我的工作自然也就大了很多，既要做到不出差错，又要按规定时间交版，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我每次看版的时候都要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常常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不能休息。有时签完版后我的眼前还若隐若现着满满的字的证券版。晨报校对室 刘军



10

## 有我参与的历史 女足泪 被我亲眼目睹

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脚印留在了奥运跑道上。1984年，许海峰第一次将奥运金牌挂在中国人的胸前。1998年，北京晨报第一个打破京城早报市场坚冰。2000年，北京晨报记者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采访区。

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最得意的报道，就是那篇名为《铿锵玫瑰，情断堪培拉》的长篇通讯。被国人寄予无限希望的世界亚军、中国女足，居然在小组赛被淘汰。至今还记得两个场景：孙雯赛后留恋地在场地上踱步又叹气；中国女足的班车在暮色中缓慢驶向黑洞般的昏暗出口。当时王鹏持证在悉尼采访体操，自己作为一个赛会非注册无记者采访足球。在赛后，我愣是凭着在一个无效的悉尼新闻中心中心的证件，在女足队员范志杰、高红等人的掩护下，混进了女足墨尔本足球赛区的驻地酒店房间，独家见证了马元安的无奈、温丽蓉的不服、刘爱玲的哀伤、孙雯的痛苦。整个采访几乎没有任何提



问，只是真实地记录，原生态场景再现。后来这篇报道获得《人民日报》全国奥运好新闻三等奖。

作为初登奥运赛场的新秀，晨报“二鹏一龙”组合凭借着激情和勤奋以及一点点运气和灵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表现超乎了预期。不然，回国时张总也不会带领编委会所有成员“打着横幅敲着鼓”到首都机场迎接我们，那待遇真是“相当的高”——比不上奥运冠军，恐怕也创下晨报历史唯一了。

晨报记者 王海鹏

## 由我定格的历史 怪米卢 我用镜头捕捉



米卢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先河。不仅因为他率领中国队打进了世界杯，也因为他的性格。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第一次把米卢纳入自己的镜头范

围内，是在他2000年7月刚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我跟着文字记者去接机，在国际到达出口前，我们能远远看到米卢在等行李，其间他一直在打电话。可是等到他一回身，发现很多中国记者在等待自己的时候，马上大步走出，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说实话，当时觉得这个教练很能表现自己，和中国队的前两任外教反差实在太大了。等回到报社洗出胶片的时候，总是感觉焦点不实，因为米卢的头发实在太乱了。对米卢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眼窝很深，很难从他的眼神中看透他的情感。包括后来的十强赛、世界杯赛场上

晨报记者 股楠

## 有我足迹的历史 老山墓 我们机智“偷访”



2000年的3月，我还是晨报的实习记者。3月17日下午，我被告知：京西石景山老山发现了一座大墓，去了许多警察。

我和时任社会部编辑的王宇辗转到了考古现场，却被工作人员挡住不让进。无奈之下，我们俩开始绕着现场转圈，绕着的围挡有条缝隙，恰好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我们欣喜若狂，先拍到照片再说，当年我们手中仅有胶片傻瓜相机，为了留住现场的宝贵资料，我俩轮换着拍照，直到胶片用完为止。有了现场照片，又回到前门与守卫理论，最终知道考古指挥部在山下不远处的临时工房内，负责人姓王（王武钰，现首都博物馆副馆长，时任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到了指挥部之后，王武钰先生啥也不透露。我和王宇在拖延着时间，其实在用心记录着屋内的一切，比如墓葬的形状图、效果剖面图等（王宇是学建筑的，对于图纸记忆又快又准）一切在头脑中准备就绪，我们起身告辞。3月18日，关于“京西发现大型墓葬”的内容见报，关于此墓葬的报道是晨报最先报道的，当日许多媒体记者拿着晨报前往老山采访。晨报首席记者 杨玉峰

## 被我感动的历史 两兄弟 由我亲手重聚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存放着一张八年前我与两个双胞胎兄弟的合影——每每看到它，我的心里总会涌出一丝温暖和感动。因为结缘晨报，两个自出生就被骨肉分离37年的亲兄弟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情。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亲情的追寻和执著也深深触动着我。我在心里祈祷，但愿能借助晨报的力量和我手中的笔帮他找回亲人。



有曾毅对晨报的信任以及户籍处的帮助，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曾毅的养母如何面对儿子找到生母？两家人今后怎样相处？针对读者关心的问题，我又做了连续报道。意外的收获是，此事件报道快接近尾声时，又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说，曾毅的生母是她母亲寻找了二十多年的二姨。一篇寻亲报道找回了两个亲人，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感悟到了当一名记者是幸福的，即便工作再辛苦也值得。

晨报记者 颜斐